

## 第二章

### 抗御外侮 亲密合作

(1937. 7. - 1945. 8.)

#### 第一节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坚持抗日救国

##### 一、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抗日主张

###### (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也从此开始。围绕着抗日战争，国际上有三种力量：德、意支持日本侵略中国；苏联和各国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坚决支持中国抗战；英、美等国则采取了“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在国内，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第一，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最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阶级中的若干人，特别是开明绅士，各民主党派，也站在抗日方面。第二，少数亲日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汉奸卖国贼。第三，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代表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一方面要抗日；另一方面又压迫人民，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还阴谋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的 $\frac{2}{5}$ 。还与日本秘密谈判，随时准备投降。这表明，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既需要进行一定的联合，以便推动蒋介石领导下的军队抗战，又需要对他们的反动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便保卫

和发展人民的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芦沟桥、“八一三”淞沪抗战、太原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中，都进行了积极的抵抗，并且还取得了像台儿庄战役这样的重大胜利。

## （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立即肃清汉奸卖国贼分子。<sup>①</sup>在7月15日送交给国民党中央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了国共合作及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第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第二，实现民主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第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改善人民生活。同年8月，共产党为了使抗日救国纲领更加全面和具体化，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战的胜利，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概括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要求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

<sup>①</sup>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sup>①</sup>这是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根本对立的。它及时地给全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提供了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行动方针和思想武器。

### （三）民主党派的抗日态度

在共产党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的同时，各民主党派也作出了响应，纷纷发表声明，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要求实行民主抗战，支持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芦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就连续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顺从民意，实行抗战。1937年6月15日，彭泽民发表《致全国各界领袖书》，提出为共同保卫民族生存与国家独立，必须一致团结，迅速建立民主政治，各党派必须平等合作，共赴国难，以战胜日寇。7月10日，解放行动委员会又致电国民党政府，进一步提出了旨在立即实行民主抗战的八大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提前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实行民主政治，发动人民抗战力量；全国各地成立在乡抗日志愿军；成立战时经济计划机关；救济广大战区的劳苦人民；统一各党派所领导的民众活动；成立武装民众指导机构；从速释放全国政治犯，取消有碍民众运动的各项特殊条例，要求立即实行民主抗战。<sup>②</sup>1938年3月，又在汉口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该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它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改革政治问题上，要实现政治民主，建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自由权利，革除政治积弊，扫除官僚主义，取消保甲制度，实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侨胞政治权力。在民生问题上，主张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高利贷，禁止奸商居奇抬高物价，救济失业，实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352—356

<sup>②</sup> 抗战行动（旬刊）、第5期特大号，1938年3月29日版。

行减租，优待出征军人家属，提高士兵生活待遇，救济难民，保育战区儿童，优待中小学教师与下级职员。在财政政策上，否定日寇在中国的债务，没收敌人在中国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筹集战时财政的大原则是有钱的出钱。在经济政策上，要发展军需企业，发展农业，努力增加战时生产。在外交方面，主张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外交、经济、债务等种种关系，联合同情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联合弱小民族和日本国内受压迫的群众，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sup>①</sup>这些意见和要求，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对共产党的号召和建议的响应，它反映了共产党所倡导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说明了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要求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基本趋于一致。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7年7月10日也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全力保卫祖国北方，支援29军的抗战；要求国民党实施抗战国策；强调指出，人民是抗战御侮最基本最伟大的力量。<sup>②</sup>因此，必须组织起全国人民，给人民以抗日活动的自由，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冲锋。同时，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也都响应共产党号召，主张立即对日寇进行抵抗。

由于抗战初期国民党蒋介石抗战比较积极，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急剧变化，所以，有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有些非分之想，采取了一些不妥当的措施。1937年9月，“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被释放不久，就发表了《少号召多建议》一文，要求人们“信任航师”，“多信托一些政府”。10月，抗战前反蒋坚决的李济深和陈铭枢等人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自动解散，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陈铭枢并痛悔过去主张反蒋抗日的

① 抗战行动（旬刊），第6期，1938年4月26日。

② 救国时报，1937年9月18日。

“这一段历史”，他们相继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过分重视蒋介石，把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无条件地放弃了相对的独立性，以换取自己的合法地位，表现了对蒋介石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一些糊涂认识。这是应该批评的。

## 二、民主党派支援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战开始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先后挺进到华北、华中敌后，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根据地。民主党派成员中，不少人积极支持共产党的活动。

当时共产党在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工作中，一个重大困难就是缺乏干部。救国会便通过各种途径动员革命青年奔赴解放区，向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干部。上海“八一三”抗战期间，沈钧儒在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时，上海、南京一带有很多爱国青年，希望先到革命圣地延安接受共产党训练，然后再去抗日前线。他们纷纷找到沈老，沈老就把爱国青年介绍给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送他们去延安求真理，然后派往敌后根据地工作。到1937年底，救国会撤到武汉后，当时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流亡出来的数以万计的爱国青年也来到了武汉，并纷纷去找他们所崇拜的救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人，救国会就派人领导他们组织青年救国团体，由沙千里、何惧等在武汉建立“救社”、钱俊瑞建立了“中国青年救国团”。两个团体都举办了战时训练班，对青年进行培训后，然后介绍他们参加各种救国工作。一部分人到医院、难民收容所，从事掩护、慰问和宣传工作；还有大批优秀分子则经过共产党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被送往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各项建设工作。他们当中很多人后来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为共产党的优秀干部。

京沪失守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季方，进入华东敌后，任战区党政委员会指导员，联络和组织地方武装，进行抗日。随后，苏北解放区日渐扩大，季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担

任军政领导职务，在解放区军民粉碎敌伪清乡扫荡的战斗中，作出了贡献。

在上海孤岛坚持斗争的吴大镛、王纪华等救国会成员，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也先后动员和组织了数千名学生、店员、工人去皖南、苏北、苏南参加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有一部分还去了延安；同时，他们募集经费支援抗日根据地，还两次组织慰问团去皖南、苏北慰问新四军。

乡村建设派投入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抗战开始后，韩复榘率领他的军队从山东不战而退。共产党在这关键时刻，却组织了山东人民就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响应了共产党的号召，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斗争。邹平乡村建设学院的一部分学生留在山东，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一起作战。他们还曾把从山东退出流亡到大后方的人员集中起来，在河南集训后，返回山东抗日，其中大部分人参加了山东敌后八路军的队伍。

致公党也支援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马来亚致公党负责人官文森，联合爱国华侨，组织“惠侨救乡会”，筹募入力、物力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他们还培养、输送一批批爱国青年回国，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一部分人参与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救国工作。

各民主党派不光是在经济、人员等方面支援敌后根据地，还在文化方面对敌后根据地作出了不少贡献。1939年1月，邹韬奋的生活书店在延安开办了新生书店，后来又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陕甘宁边区和苏北盐城敌后根据地，逐步设立了华北书店和大众书店。盐城的大众书店还逐渐演变成为共产党盐阜区党委领导下的一个出版发行机构。这些书店销售大批进步的革命书籍，对教育和武装根据地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起了良好的作用。1940年国统区的生活书店不断遭到国民党封闭后，邹韬奋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将一部分人员转移到敌后根据地，将书店出版发行的重点也转向解放区，从而丰富了解放区的文化生活。

### 三、民主党派宣传鼓动群众参加抗日

共产党全面抗战的路线在民主党派中得到积极的响应，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创办各种刊物，与共产党一起进行全民抗战的宣传和鼓动。

#### （一）救国会的宣传活动

邹韬奋等经过多方筹备，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办起了《抗战》三日刊，救国会成员胡愈之、金仲华、杜重远、张仲实、柳湜、钱俊瑞等积极为该刊撰稿。该刊大力主张加强全民族团结，进行持久抗战，要求开放民众运动和言论自由，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和妥协倾向。它还连续发表文章，报道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介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招生事项，还对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的抗战功绩予以记述。由于它的这些进步性，与共产党配合默契，办得很出色，所以，周恩来赞扬它“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反动派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sup>①</sup>

1937年12月，沈钧儒、李公朴等在武汉创办了《全民抗战》，不久，该刊又和邹韬奋主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改名《全民抗战》，由邹韬奋、柳湜分任正副主编，沈钧儒、张仲实、胡绳等任编委。1938年9月，他们又创办了《救亡日报》和《国民公论》旬刊，分别由夏衍、张仲实等编辑。为了用更通俗易懂的文字向劳动人民进行抗日宣传，沙千里等还在武汉创办了《大众报》。这些刊物都拥护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以此作为救国会各报刊宣传的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各报刊都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提倡开放民主，发展人民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尤其是《全民抗战》，它继承了《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刊》的进步传

<sup>①</sup> 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112

统，在“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口号下，又改进了形式，充实了内容，议论精辟，文笔生动，广大人民很喜爱它，每期发行量竟达30万份，“风行海外，畅销寰宇”，成为国统区影响很大的刊物，对全国抗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还编辑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了大量的工作。

除办报刊宣传抗日外，他们还经常到工厂、学校、团体参加各种形式的群众集会，发表演讲，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活。许多救国会成员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抗日宣传队，遵从周恩来的指示，去各战地进行抗日宣传。李公朴去延安，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组织了“抗战建国教育团”，到山西敌后根据地开展抗战教育，还举办短期艺术训练队和一些短训班，把抗战教育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

## （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宣传活

在武汉，他们创办了机关刊物《前进报》和《抗战行动》杂志（旬刊），宣传了全民抗战的主张和各项政策，阐述了坚持抗战可以完成国家的统一，实现民主可以保障抗战的胜利的基本观点。在广东，出版了《抗战农村》，宣传为了抗日，必须到农村去的观点。

章伯钧与共产党驻武汉代表团取得了联系，得到共产党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建立宣传队伍，组织了两个群众性的进步团体，与共产党一起宣传抗日。第一，组织黎明抗敌剧团，他们排演当时流行的抗日短剧《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大路歌》等抗日歌曲；绘制和张贴抗敌宣传画；积极参加要求抗日民主的群众大游行。到1938年夏，他们还进一步把工作重点放到汉口的工厂区硃口，设立黎明剧团分团。硃口分团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发展组织。他们每天晚上向工厂职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宣讲全民抗战的道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工人群众所迫切关心的问题，每次听众都有一二百人之多。



影响逐步扩大。国民党当局对他们的进步宣传十分愤恨，进行特务监视，在1938年秋终于被勒令停止其活动。第二，组织“青年抗战工作团”。它是由王一帆、覃汉川、张纯、王导、王文朴、芦秋田等，仿照共产党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办法建立起来的。“青年抗战工作团”，十分注意团结爱国青年，经常举行各种座谈会、演讲会；组织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讨论怎样实现民主团结、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等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他们积极宣传的影响下，有些爱国青年遂进而提出要直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直接投入对日寇作战，准备献身于祖国。但是，共产党驻武汉代表团与章伯钧联系商量，没有组织进步青年深入农村抗日根据地，参加各地游击战争，后来只有少数进步青年参加了新四军。这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当时的政策有关，长江局认为中心任务是保卫大武汉，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此为转移，所以重心放在城市而不在农村，没有接受要组织爱国青年到农村去的观点。应该说这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失误。不过，这也说明，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等领导人与共产党合作得较好，听从共产党的意见，接受共产党的主张。

#### 四、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

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面，有个重要思想，就是要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派及人民团体的进步分子。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1938年3月1日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指出：“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为事实所不许”，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去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拟定统一战线纲领”，“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大计，和调解各党、各团体之间的关系。”还强调指出，

当前“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加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压力，遂于3月29日至4月1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所谓《抗战建国纲领》，宣布设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民意机关，邀请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之。

面对国民党设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共产党的态度怎样呢？毛泽东等七位参政员，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一文中表示：“在目前抗战的剧烈环境中，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毕竟“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展”，“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诚意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携手和共同努力，以期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以便能够有效地打击与战胜日寇，并奠定使中华民国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的基础。”<sup>①</sup>共产党可以借国民参政会冲击国民党的限制，督促蒋介石实行民主的诺言，推动国民党抗战。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也表明他们与共产党基本一致的态度。在“我们对于抗战建国纲领的意见”中，肯定它是“跟着民族主义的抗战展开而产生的政治改革的起点”，并要求“国民党必须以身作则，忠实的执行这纲领，”并且“应该号召全国人民以及在野党派，积极的讨论，发挥和补充这个纲领，”使这个“带原则性的纲领，能及早具体化，实际化，以“制成抗战时期的全国共同纲领，交政府颁布施行”，否则“会变成白纸黑字的条文。”<sup>②</sup>章伯钧也发表了“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肯定设立国民参政会是

<sup>①</sup> 新华日报，1938年7月5日。

<sup>②</sup> 抗战行动（旬刊）第6期，1938年4月26日。

“已经开始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虽然，“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民意机关”，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参政会的实现，及其发展，是可以成为走向全民救亡代表大会最高原则的一种步骤。”他还提出，参政会的代表应“由各党派自己推选”，“保障他们有自由讨论与发表主张”等权利；“参政会得有自行召集会议之权”，“有制定法令之权”等，以真正实现“团结全国力量，以利国策与施行。”<sup>①</sup>这些合理的主张，表达了他们的愿望，是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鞭策。

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初，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出席会议，认真提出关于施政方针的建议。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武汉召开，130多名参政员出席。会上，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提出了一系列提案，如：“正式确定抗日各党派之合法地位”，“严令废止党部及各级政府压抑民众救亡运动”，“根本改革现行保甲制度”，“明令减除苛捐杂税、减少高额地租、取缔高利贷”等。这些提案对抗战和改善国内政治状况，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惜实效甚微。

抗战初期，这一年多的时间的主要特点是拥蒋抗日，没有什么反蒋言行，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诸多问题上合作得较好，是一种真诚的、密切的合作，尤其是在“抗日”这个问题上合作的成果显著。但是，这时也有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过分相信国民党、蒋介石，把抗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有人认为，国民党是“唯一领导抗日地位”的，其他党派应绝对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而不应强调各自的独立性，否则，“就要负破坏统一、分裂抗日战线和危害国家的责任。”<sup>②</sup>导致这些错误认识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们本身的阶级地位和思想所决定的。二是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抗日还是积极的。三是中共内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观点的影响。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不是所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是如此，有

① 抗战行动（旬刊）第6期，1938年4月26日。

② 包清岭编，抗战文选第2辑，1938年5月。

不少民主党派领导人就不接受蒋介石的利诱，保持其独立性，有时还批评蒋介石的错误。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黄琪翔就与共产党一起，没有放弃原则去单独与蒋介石谈判，换起一席之地，而是要国民党从根本上改弦更张。国民党曾几次找他俩谈话，要求他们放弃其独立活动，但毫无结果。蒋介石后来又通过陈诚的关系，以给黄琪翔的官职、地盘、经费为优惠条件，要黄取消第三党，合组三青团，但黄立场坚定，不为所动。蒋介石又通过陈公博的关系，单独找彭泽湘谈合作条件，又遭到彭泽湘的坚决拒绝。蒋介石每一着都失败后，又想出一妙计，曾允诺章伯钧以国民党部长头衔，要章去作大官，条件是一个，去掉第三党的旗帜。章没有动心，坚持打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旗帜，与共产党一道，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这不仅说明他们的人格高尚，不为五斗米折腰，也说明他们对国民党的认识比较清楚。

## 第二节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反对投降、分裂、 倒退，坚持抗日、团结、进步

### 一、反对卖国投降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显著标志是：出现了日寇对国民党的诱降，英美加紧劝降，汪精卫叛国投降，蒋介石集团动摇妥协的错综复杂局面。在此情况下，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坚持密切合作，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不得不停止正面战场的进攻，而把主要兵力用于保守其占领的地区，并对抗日根据地  
进行扫荡，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修改了过去不以国民党政府为谈

判对手的政策，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抛弃抗日的政策，可以与之谋求和平。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加之英美等国的劝降，致使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反共活动加剧起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自1938年春开始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信使往返，密商投降条件。12月18日，汪精卫脱离重庆，19日飞往越南河内，公开发表投降声明。汪精卫集团的其他人员也相继叛国投敌。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集团更加动摇，一度妥协投降空气甚嚣尘上。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建立起一个汉奸傀儡政权。汪精卫集团的公开投敌，激起了全国界的无比愤怒，共产党和抗日的各民主党派一道，一致声讨汪精卫集团，反对一切卖国、妥协、投降活动。

#### （一）民主党派声讨汪精卫叛国集团

1939年1月2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史良、张申府、胡愈之等21名联名发《快邮代电》，指出：“汪兆铭叛党叛国，通电求和，违反国策，惑乱人心，固革命政党所不容，亦全国人民所共弃。”对于这种罪恶行径，“我全国同仇敌愆之决心，绝不致受其影响，”并且，“自兹以后，凡属言论行动表现妥协动摇倾向分子，均应随时揭发，严加制裁，以击破日寇之诡计，巩固革命之阵营。”<sup>①</sup>此电发表不久，救国会又一领导人王造时又发表了《汪逆为什么做了汉奸》等文章，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汪贼的卖国罪行。在此之前，1938年11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王造时等联合66位国民参政员，提出了由参政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奋起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的提案，被大会所接受，并作出决议明确指出，全国人民应按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争取主动之政府既定方针，坚决抗战，决不屈服，共守弗渝，以

---

<sup>①</sup> 沈钧儒等。快邮代电。原载全民抗战五日刊，第46期，1939年1月2日。

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sup>①</sup>这是救国会和各抗日民主党派对主张与日寇妥协投降派的一记响亮耳光。

1939年，英美等国也企图对日妥协，加紧牺牲中国利益，阴谋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之时，国民党内的投降妥协之风又趋上升，投降危险又严重起来。针对这种情况，沈钧儒接受共产党重庆《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时，强调指出，抗战时期的外交原则就是要一定有利于抗战，一定要能增加抗战力量。抗战建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不能幻想依赖外交解决中日战争的问题。<sup>②</sup>

此外，救国会还经常采取隐蔽方式，研究对国事的态度，讨论救国会反对投降，实现抗战到底的主张。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与共产党一起同国民党内的妥协投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39年1月，发出《声讨汪兆铭通敌日本》电，严厉斥责汪精卫等的叛国罪行，认为“汪兆铭今日之公开叛国，实为其过去行为发展之必然结果。”他们严正要求国民党应“通缉汪兆铭，归案严办，”并对其党羽“应撤查缉办，以期除恶务尽。”<sup>③</sup>

## （二）共产党反对叛国投敌

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贯主张武装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洞察到，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不是他个人的行动，是国民党阵营的分裂，是国民党长期政策的必然恶果。事实也是国民党文武官员投降敌伪者络绎不绝，形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据统计，1941年至1943年8月以前，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旅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58人，

<sup>①</sup> 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514

<sup>②</sup> 沈钧儒先生年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增刊第四辑），中华书局1979年。

<sup>③</sup> 声讨汪兆铭通敌日本电，中华论坛第一卷第10—11期，1945年12月。

军队 50 万人投敌。且有一部分中间派的人物参加了汪伪政权，如：青年党、国社党部分成员。面对这种局势，共产党不光要反汪精卫，还要反“李精卫”之流，反对一切妥协投降活动，把蒋介石集团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面。共产党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后，立即于 1939 年 1 月 2 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社论《汪精卫叛国》，揭露了汪精卫叛国投敌，自绝于中华民族的反动实质，批判了汪精卫之流的民族叛贼们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亡国论调。中共中央还在 1 月 5 日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中说，在目前形势下，我党的任务是，拥护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抗战，开除汪精卫出国民党的进步行动；坚决打击卖国贼、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批判其汉奸理论。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在党内发指示，在报刊上发文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而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就是准备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投降反共的紧急情况下，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继续抗日；坚决反对投降活动，坚决反对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共产党还领导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掀起一个声讨汪精卫叛国集团的高潮，举行各种形式的讨汪大会。各根据地还发表讨汪檄文，编演戏剧等形式声讨汉奸卖国行为。在 1940 年 4 月 15 日八路军、新四军发出讨汪精卫救国通电，表示要誓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除敌伪，还我河山，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sup>①</sup>

由于共产党和各爱国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汪精卫叛徒行径，蒋介石也不敢公开投敌，在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中央为汪精卫投敌致各级党部的对内指示中，申明：汪精卫的行为不代表国民党，国民党的抗战国策不变。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汪精卫党籍，到 6 月 8 日又下令通缉汪精卫。同时，国民参政会也反对一切妥协投降活动。

<sup>①</sup> 八路军、新四军讨汪通电，载解放周刊第 105 期，1940 年 4 月 30 日。

### （三）国民参政会反汪的积极作用

在全国人民声讨汪逆的浪潮下，有中国各抗日党派参加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于1939年2月19日在重庆召开，此时正值汪精卫潜行海外，通电投敌之后。大会针对日本近卫声明和汪精卫的“艳电”，通过了《拥护抗战国策案》，重申维护抗战国策，抗战为既定方针，必须坚持到底；号召全国人民，坚其信心，齐其步伐，一心一德，彻始彻终，以复我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从而完成抗战建国大业。<sup>①</sup>同年9月9日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正值汪精卫在日本扶持下筹备拼凑傀儡政府之时，大会又发出“声讨汪逆兆铭电”，并通过《否认伪组织及通电声讨汪逆案》，严正指出，“忠奸不两立”，“汪兆铭等出卖祖国，已自绝于人类”，“凡其所组织之机关，全为敌人所制造之傀儡。”因此，“宜膺显戮，以彰国法”，“一致斥伐，以昭大义”。<sup>②</sup>1940年4月1日召开第一届参政会第五次大会，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已正式宣告成立，因此，此次大会讨汪逆成为会议的中心内容之一，大会通过《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通电，尖锐地指出，“敌人占领地，安能有政府？降人订伪约，安能有效力？4亿5千万同胞以血汗保障之国家主权，安能容敌伪盗窃？无量数忠勇将士及各项辛勤工作人员血战三年取得国防之信誉，安能被敌伪动摇？”<sup>③</sup>国民参政会的这些决议代表了共产党和抗日的各党派的意愿和声音。

国民参政会反汪的意义，不仅是反对汪精卫这批汉奸卖国贼，还要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内部以投降反共活动响应汪逆的败类，给予沉重打击，这一斗争后来扩展到全国，共产党领导掀起了一个反汉奸的群众运动。正如毛泽东等七参政员，“对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中所指出的，“总观国民参政会既往

<sup>①</sup> 国民参政会，拥护抗战国策案（一届三次大会通过），见新华日报，1939年2月22日。

<sup>②③</sup> 否认伪组织及通电声讨汪逆案、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之工作，其最大成就，就在于今日中国的最迫切的最中心的政治问题上，在坚持民族自卫战争争取最后胜利及打击各种中途妥协的倾向与罪恶活动上，能够真实地反映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要求。”<sup>①</sup>

国民参政会在反汪问题上能够做到这些，表明中国人民抗战势力不可阻挡，这也是中共和各抗日民主党派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假若没有这种努力，没有与国民党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很难想象国民参政会有那么多正确的决议。所以，国民参政会上的反对汪精卫投降卖国，亦是共产党与抗日民主党派合作的又一大成果。

## 二、消除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反共摩擦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以防共反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五中全会，把政策的重点由对外抗日转向对内反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会后，国民党又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秘密文件。国民党顽固派在这种积极反共方针的指导下，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大肆进行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放毒暗杀、摩擦进攻等种种破坏活动。

1939年至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摩擦，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和救国会等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站在一起，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这种破坏团结、危害抗战的反共活动，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表现了他们坚持正义的立场。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摩擦，他们调兵遣将，向陕甘宁、晋西、晋东南三个敌后根据地发动武装进攻，袭击了八路军驻防的五个县城，还分三路进

<sup>①</sup> 原载新华日报，1939年9月9日。

攻我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共产党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给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打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国民党顽固派还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展开了进攻，叫嚷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应该收起共产主义；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应该取消等反动谬论。重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老调。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系统地批判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谬论。

救国会对于国民党的反共磨擦进行了公开的谴责。1940年1月，沈钧儒为《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写了“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的题词，<sup>①</sup>号召人民起来维护团结，反对投降。邹韬奋在国民党中央大学的一次演说中，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径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他愤怒地指出：“大敌当前，不团结御侮而自相残杀，只等于破坏抗战，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此外没有什么可得。”<sup>②</sup>邹韬奋还在《和朱总司令太行山口号》一诗中，写下了“团结有谁敢破坏，非我族类嫉如仇”的诗句。国民党顽固派对救国会的这种态度非常恼火，便对其进行诬陷和迫害。1940年5月初，何应钦竟在国防最高会议的报告中说，据“情报”，沈钧儒、邹韬奋等将于“七七”或“双十”在重庆领导暴动。同时，国民党军警机关对救国会领导人的住宅进行了严密监视。后来，沈钧儒、邹韬奋等去军事委员会向何应钦当面提出质问，国民党才未敢对他们下手。<sup>③</sup>但仍有不少与他俩有联系的爱国青年受到牵连，被国民党无辜逮捕甚至杀害。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标志着第二次反共摩擦已达到高潮，中华民族的抗战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国民党这一行为遭到爱国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严厉斥责。

① 原载新华日报，1940年1月11日。

②③ 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123，126

1月12日，在香港的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人彭泽民与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联名致函蒋介石，指斥国民党破坏和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要求立即停止对新四军的进攻。信中指出，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摩擦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闻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战已成之基础堕于一旦，而时势所趋又非昔比，则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更有不堪设想者。”他们在信中还重申了孙中山联俄联共的主张：“我总理过去提携共产党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伟谋远见，无待赘言。是以总理临终时曾致书苏联其本旨外在联合苏联，而内在训示吾人应以国内和平合作团结互助为重。各同志对此当所念念不忘。今兹日寇欲沦亡我国于殖民地，日寇为我党之敌人，也正为共产党之敌人；敌人之死敌亦即为我之良友，则我党不宜以如何消灭共产党为决定政策之出发点。”中国要坚持抗战的民族大业，就必须发扬民主，实现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团结，“党派问题，决非处理共产党一党之问题，而为处理我党以外各抗日党派之一般原则。各党依法自由发展，本为民主国家当然之定则，而各党各派在同一革命目标下不互猜忌，尤为我国在抗战时所必要。”宋庆龄等还在信中指出，进攻共产党只能削弱抗日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今日敌人既濒败境，惟欲我抗建实力之削弱，以至于消灭，于是惟欲我发动剿共以造成无限制之内战。”他们最后要求国民党当局“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sup>①</sup>为了进一步击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又联名致电蒋介石，痛斥蒋先生破坏抗战、反共分裂的倒行逆施，电报说：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日必须绝对停止以武

<sup>①</sup> 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30 132

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sup>①</sup>

救国会也坚持正义立场，反对国民党的罪恶行动。邹韬奋主持的《全民抗战》和胡愈之主持的《国民公论》，都发表了主持公道、揭露真相、谴责顽固派反共罪行的言论。结果，这两个刊物都被国民党查封了。但这并不能使救国会改变其立场。在皖南事变后召开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中，国民党顽固派公开咒骂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籍的参政员都退出了参政会，救国会籍的参政员也随之退出了国民参政会，<sup>②</sup>以实际行动表示对顽固派反共行径的抗议和对共产党的有力支持。由于救国会反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942年7月产生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时，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史良、张申府、王造时的参政员资格就全被国民党无理取消。这虽然使救国会失去了参政会这个讲坛，但它却无法停止救国会反对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维护人民利益的斗争。这更加促使救国会与共产党联合起来，抗日救国。

在香港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党员，还同其他爱国人士400多人联名给蒋介石政府发出了制止内战的通电。

由于各爱国民主党派与广大人民对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与共产党战斗在一起，使国民党顽固派陷于孤立境地，蒋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其反共活动，他们的预期目的没有完全达到，第二次反共磨擦即被挫败。

1943年3月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磨擦制造宣传舆论，到7月7日，胡宗南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军事磨擦。这些反共行为，不仅激起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反抗，国统区的各爱国民主党派也强烈抗议。职教社主办的《国讯》，即曾呼吁每人把自己所有

<sup>①</sup>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146

<sup>②</sup> 史良，关于救国会的一些回忆，救国会，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智力和体力,尽量贡献给中华民族生存的抗战,反对把力量消耗在内战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致书蒋介石,正告他“正应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以力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而达到将来世界之大同,尚何凭借武力以为内争之有?”<sup>①</sup>救国会领导人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再一次进行了回击。同年11月7日,沈钧儒、陶行知、茅盾和郭沫若等以中国文化界的名义,致函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袖和民众,向他们热烈祝贺十月革命节,对伟大的十月革命给以极高的评价,信中说:你们替全人类树立了崇高的楷模,你们真正民主精神的领袖;我们要尽力地效法你们,力求本民族的解放。这封信的内容表面看是对斯大林的,实质上是针对蒋介石散布的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的论调最有力的还击。这是与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配合,是对国民党反共逆流的坚决揭露和有力批判。

蒋介石面临这种形势,不得不停止军事进攻。1943年9月,他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作了妥协,中共的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随后,国民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恢复了同共产党的谈判。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反共磨擦,当然主要是共产党在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军事上给了国民党军队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共产党得到了爱国民主党的帮助,他们给国民党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起了共产党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们站在共产党一边,使国民党陷于孤立,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蒋介石也必然要考虑到这一后果。所以,在打退国民党的三次反共磨擦中,有爱国民主党派的一份功劳。这是值得后人记取的,不应忘怀。

---

<sup>①</sup>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致蒋介石书,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

### 三、开展民主宪政运动

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及其政治上的种种倒行逆施，不仅激起了共产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反抗，也引起了各民主党派的愤恨和失望。各抗日党派依旧处于非法地位，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他们已不再像抗战初期那样一致拥蒋了，转而与共产党携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兴起了一个民主宪政运动。

共产党和各抗日民主党派要求实现民主宪政的主张，是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共产党的参议员毛泽东、陈绍禹等，发表了“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就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党派合作六个方面提出了政见，指出，“要实现抗战民主，严惩对民众和青年的非法压迫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战之权利；”“加强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要做到这些，国民党必须做到以下三条：第一，“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认真取消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第二，“严禁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严禁因所谓党籍及思想问题而妨害到工、农、军、学、商各界人民及青年之职业及人权之保障，以便造成举国一致精诚团结现象。”第三，“在抗战各种工作中，广泛地容纳各党派人才参加，不以党派私见摒弃国家有用人才。”<sup>①</sup>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议员章伯钧等36人，向参政会提出了“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他们明确指出，“抗战两年，所流者全国国民之赤血，所竭者全国国民之脂膏，在现行党治之下，政府仅能对党负责，对全国国民几无责任之可言。”名不正，则言不顺，以此而求国民之

---

<sup>①</sup> 毛泽东等，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载新华日报，1939年9月9日。

效死，实难办到。为动员人民进一步投入抗战，“以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为第一义。”“环顾当世各界，并无借口战争而脱离宪政常规者，即敌人亦莫不然，”况且我国参加抗战效忠国家者有各党各派，并不限于在朝之一党，可见借口抗战而谓宪政未可立即施行者，其理由自不成立。他们还提出了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具体办法：第一，由政府授权国民参政会本届大会，推选若干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制定一可使全国共同遵守之宪法。第二，在国民大会未召集之前，行政院暂时对国民参政会负责，省、县、市政府分别暂时对各级临时民意机关负责。第三，于最短期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全国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平流并进，以杜纠纷，共维国命。<sup>①</sup>

在此次会上，其他党派的参政员亦提出各种宪政主张。救国会领导人王造时等37人，提出了“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救国会参政员张申府等21人，提出了“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中华职业教育社参政员江恒源等40人，提出了“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

所有这些提案，内容均有所不同，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实施民主宪政的要求，并望立即实行。在会上讨论这些提案中，由于立场等关系，分歧很大，以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为一方，以国民党参政员为另一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最突出的问题是，要不要把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和结束党治问题写入决议中。国民党参政员大谈不必写入决议，而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针锋相对，坚决主张写入决议。由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通力合作，经过艰苦的舌战，最后，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此案的通过，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同国民党共同

<sup>①</sup>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584—585

斗争的成果，是民主势力反独裁专制的—个重大胜利，也是民主宪政运动的开端。

民主宪政运动首先在陪都重庆展开，然后向全国发展。1939年10月1日，国民参政员沈钧儒、褚辅成、张澜、章伯钧等共同发起。在重庆银行公会，邀集各界著名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到会百余人，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及《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等亦应邀参加座谈会。会议—致决定经常举行这种“宪政座谈会”，将发起人由13人增为25人，包括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秦邦宪等人在内。后来，“宪政座谈会”经常举行，到1940年3月止，共举行8次，参加者多为热心宪政的各界著名人士，每次到会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二三百人，会场常被挤得水泄不通。座谈会怎样推进宪政、宪政与抗战建国的关系、对宪法草案的研究和意见、对国民大会的意见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共在重庆的党员积极参加并从各方面支持了这些活动。另外，从1939年10月14日起，重庆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和其他青年团体也多次举行宪政座谈会，邀请共产党人徐冰、潘梓年等参加并发表讲话和演说。同年11月19日，筹备成立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推举沈钧儒、董必武等85人组成宪政促进会筹备委员会。在全国各大城市和解放区都成立了各种推进宪政运动的组织，如，妇女宪政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各界宪政促进会等。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在报刊上纷纷发表关于宪政问题的言论。不少报刊发表各种宪政论文，刊载宪政问题讨论大纲，出版宪政专著等。宪政运动遂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

共产党对民主宪政运动十分重视，延安和各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展开活动。1939年10月2日和12月1日，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党发出关于宪政运动的指示，指出，国民参政会通过的“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虽较空洞，但不失为进步的决议，而且的确反映了全国人民目前的迫切需要，我党各组织应运用这一决议，积极参加民主宪政运动，要求立刻实行民主政治，召集



真正民选的全权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sup>①</sup> 中共中央还说明其根本主张是要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由于中共非常重视民主宪政问题，1939年11月以后，在延安陆续成立了“妇女宪政促进会”、“新闻界宪政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商人宪政促进会”等。在此基础上，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代表1000余人，在中央礼堂举行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选举吴玉章为理事长，并发表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提出了四条主张：第一，今日实施宪政之意义，在于发扬民意，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国民大会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其代表必须重新选举；第三，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彻底修正，国民大会应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第四，全国应发起普遍深入之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之自由。<sup>②</sup> 这几项内容公开表达了中共对宪政问题的根本主张。毛泽东自始至终非常重视这一运动，他发表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著名演说，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骗局，指出了如果要实现宪政，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轻易到手的想法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被选为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46名理事之一。此后，延安有18万青年救国会员，全部加入了宪政促进会。

在华中和华北等共产党创立的敌后根据地各界人民中，也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1940年2月，成立了“山东全省宪政促进会”、“鲁南妇女宪政期成会”。3月，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成立了“新闻界期成会”；皖南成立“宪政运动期成会”。各根据地的各种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广泛展开。

面对全国各界的民主宪政运动，蒋介石的态度怎样呢？他是借实行宪政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一语道破了宪政天机：宪政可以研究，最好由少数学者在房间里研究研究，

①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1068

②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解放周刊，第102期，1940年3月出版。

不要发表文章，搞什么运动。<sup>①</sup>事实上，国民党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宪政团体的活动，1940年9月，还宣布国民大会因交通不便不能按期召开；不久，就制造了第二次反共磨擦，进一步迫害各界民主力量。一场民主宪政运动被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压制下去。到1943年底，沉默了一年的民主宪政运动又再度兴起，形成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但在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成立联合政府，最终撕下了准备“实施宪政”的伪装。

#### 四、共产党支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共活动，消灭异己的反动政策，使得各民主党派对蒋介石日益不满，由原来的拥蒋抗日变为有些失望。他们也认识到，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取得的结果，是各党派联合和斗争的结果，如果缺少联合，单凭各自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对此，他们感到这种联合还不行，必须要有一种组织形式统一起来，形成一种“第三者”的政治力量，参与调解国共纠纷，力促国民党实施民主宪政，以利团结抗战。于是，1939年11月23日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在重庆公开联合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初步形成了“第三者”力量的联合。黄炎培当选为主席，章伯钧等五人为常务干事。他们的宗旨是：“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国事，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sup>②</sup>

共产党坚决支持“统一建国会”联合起来的行动。中共中央于1939年12月1日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中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

<sup>①</sup> 邹韬奋，经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247

<sup>②</sup>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教学参考资料（内部版），344

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sup>①</sup>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也强调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sup>②</sup>到1941年，毛泽东又指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sup>③</sup>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抗战时期，十分重视中间党派在抗战中的作用，一直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把他们作为共产党的辅助同盟军。在实际工作中，中共中央还坚决贯彻这一政策，成立专门机构来从事这项工作。1940年10月2日，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分局及省区党委《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组织和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自中央局至省委或区党委，必须设立统战部，”“负责进行各党各派及地方上绅、名流文化人的统战工作。”并规定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为“各党各派（从国民党、第三党、国社党、救国会、职业教育社、生活教育社、乡村教育社）及各地方实力派，各种友军。”

在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共产党人支持中间党派的联合，重视争取团结中间党派。他们在重庆经常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接触，不辞劳苦地出席各民主党派召开的聚餐会、时事座谈会、联欢会、报告会等各种集会，不分昼夜地接待他们的来访，向他们讲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阐明共产党对他们的方针政策，遇到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事先与他们共同商讨，对他们联合起来的愿望给予鼓励、支持和帮助，还在他们内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协调他们的关系。对他们的每

---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内部版），290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747—748、783

一点进步，有利于抗日和人民的言行，都给予鼓励和支持，对他们的动摇态度则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

国民党又发动第二次反共磨擦，这件事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各党派本身的联合，也促使他们与共产党合作。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谈到：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他们认为这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势力斗争问题。这就使共产党更加成了中国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各爱国民主党派希望与共产党合作，以反抗国民党的压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因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欺压，促使其积极整顿自己的组织，并提出联苏、联共的主张，并派章伯钧、丘哲为代表与中共代表进行谈判，表示合作的诚意，希望共产党对他们的政纲、组织、宣传及经济方面给予切实的援助。为此，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支持和帮助下，1941年3月19日，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会上通过了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宣言、简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在国统区不能公开活动，没有合法地位，遂决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在香港办报，力图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宣传他们的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然后再公开同盟的组织，造成木已成舟的局势，迫使蒋介石承认其合法地位。这一决定对蒋介石国民党是保密的，因为蒋介石是不允许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组织的。但是，梁漱溟却向驻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报告了这个计划，并与之接头商谈后，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支持和鼓励。5月梁漱溟经桂林到达香港后，得到中共驻港的秘密组织的具体帮助，开始筹备出版报纸。共产党对这种报纸，在财力和人力方面予以全力支持，于是，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公开出版。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国内外公开宣布成立。它的公开活动，对于推进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投降反共政策，坚持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是有积极作用的。

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也热烈地支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及时地报道了他们的情况，10月28日还发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社论，称赞他们的诞生，“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认为他们的纲领，强调了“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社论还衷心希望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各党派，在民主大旗下，更进一步的努力，愿其所负担的使命迅速实现。”<sup>①</sup>社论还分析了民主政团同盟的奋斗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停止的，鼓励他们要为抗战和民主事业而勇敢奋斗。

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罗隆基在昆明创办支部时，昆明的共产党组织也予以全力支持。地下共产党员周新民在重庆已参加了民主同盟，他又特地到昆明的云南大学教书，实际上是到昆明去帮助民主同盟去发展盟员的。地下党员李文宜也到昆明进行妇女方面的民主同盟工作。昆明的民盟支部后来发展得比较好，成为当时昆明学生运动的有力推动力量，这实际上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对民盟工作极大支持和鼓励的结果。共产党不仅支持昆明的民盟工作，在西南和西北各城市的民盟工作中能够得到成立和发展壮大，亦是共产党帮助的结果。

与共产党相反，国民党当局却拒绝承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合法地位，还对其盟员进行监视、打击和迫害。但是他们毫不畏惧，照样在重庆进行民主活动，1941年11月16日还举行茶话会，由秘密变为公开，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过程和出版机关报，本身就说明了共产党与他们的亲密关系，得到了共产党在政治上、经济上、宣传舆论上、道义上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合作，该

---

<sup>①</sup> 中共中央主办：解放日报 1941年10月28日

组织的成立和公开会困难得多。这个事实也说明，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同蒋介石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从相持阶段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史实看，应是多方面的，远不止以上几项。在合作过程中，共产党起了核心作用，民主党派领导人接受了共产党所提出的各项主张和纲领，各方面的工作配合默契，合作的程度是密切的，也是党派之间的合作。通过这时的密切合作，使民主党派更多的领导人看清了国民党的独裁与腐败，对国民党逐步失去信心，开始抛弃对国民党的幻想。他们的立场、观点起了很大的变化，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这也促使他们认识到，中国要争取民主自由，一定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与共产党相互支持，休戚与共，也只有与共产党的密切合作才能取得某些胜利。

### 第三节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 一党专政，主张建立联合政府

#### 一、国统区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沉默了三年的民主宪政运动，在国统区再度兴起。首先是由于国内危机局势的强烈刺激。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中国国内，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却遭到了又一次大溃败，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政治上国民党强化特务统治，镇压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吏治腐败。经济上，国民党实行统制制度，物价上涨，民生凋敝，民怨沸腾。这种危机形势，促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立即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以挽救当前的严重危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所以，国统区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出现了一派争取民主自由，要求抗战到底的新气象。其次，国际舆

论也批评国民党。1943年夏，国民党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受到苏联报刊的严厉谴责，也遭到英美舆论的批评。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均发表文章指责国民党抗战不力和挑起内战的错误。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正积极部署反攻，客观形势要求中国的抗日力量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寇的侵略，所以，盟国对于国民党政府顽固实行一党专政也有责言。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议：“中国宜从早实施宪政；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派处同等待位，以解决纠纷；战后建设须自筹经济。”<sup>①</sup>1943年12月在“开罗会议”中，罗斯福也曾表露出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满，明确表示，国民党“这种政权决不能代表现代民主，”并要国民党政府“在战争尚在继续进行的时期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sup>②</sup>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蒙蔽国际视线，只好再次打出“宪政”的旗号。1943年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所谓“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的决议。10月20日，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决定设置宪政实施协进会。11月12日，在重庆成立了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宪政实施协进会，54人组成，孙科、黄炎培、王世杰为召集人，该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负责修改宪法草案。

共产党对这次宪政运动，既看清了国民党的欺骗性，又抓住这个时机，参与了这场运动。1943年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深刻分析到，国民党“还想打着抗日的招牌，还不愿丧失国民党的国际地位，有时也还顾虑到国际国内的舆论指责，所以他们可能暂时地拖一下”，事实上“他们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至少现时他

<sup>①</sup> 1943年9月10日“黄炎培日记”。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增刊第5辑。中华书局1979.39.

<sup>②</sup> 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总统见闻秘录。春光新闻社。1947.154—155

们绝无此种诚意。”<sup>①</sup>但从团结抗战的目的出发，中共中央仍决定积极参加这场民主宪政运动，于1944年3月1日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告诫全党，只要国民党允许人民讨论宪政，就有可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把民主运动推进一步；共产党不仅要参加这一运动，并要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在自己的周围，以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的大会上，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的讲演，重申了共产党要求修改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重选国大代表的主张；并提出实施宪政所必须实行的三项先决条件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地方自治。他还指出，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18年了，至今还没有实行民主。我党毛泽东同志老早就说过，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它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这个道理，现在全国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宪政运动，都一致指出：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sup>②</sup>周恩来的演讲，指明了宪政运动的方向，推动了民主宪政的进一步开展。为达团结抗战的目的，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先后在西安、重庆两地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南方局还分别派华岗、张友渔等到重庆、昆明等地，广泛团结和联络各界民主人士，宣传共产党的主动，推动民主宪政运动。

1944年1月至5月，各民主党派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纷纷举行宪政座谈会，各党派的报刊也发表了大量宣传民主宪政的文章，抨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要求重新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彻底修改《五五宪草》，立即实行民主。自5月始，大后方各地的许多报纸如重庆的《新蜀报》，成都的《华西日报》，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918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509。



明的《云南日报》，西安的《秦风日报》等，也接连不断地发表社论和短评。仅《华西日报》，1944年5月10日至6月13日，发表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社论和专论有17篇，大声疾呼，“非民主不能动员国力，非民主不能强化团结，非民主不能澄清吏治，非民主不能激扬士气，非民主不能增加外援，非民主不能粉碎进攻与准备反攻。”<sup>①</sup>并痛斥各种排斥民主，坚持独裁的反动理论。

1944年4月28日，重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章伯钧（第三党）和救国会沈钧儒、张申府，联合举行文化界招待会，宣布要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要求国民党切实实行民主改革。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揭露国民党长期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所造成的恶果，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训政十余年，国民的组织未见加密，国民的道德未见提高，贪污土劣只有增加，并无减少，糜烂腐败更见普遍，并未减轻，事实如此，这还不值得主张训政的诸公加以切实的反省？”文章还抨击了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反动本质，指出：“假定一个国家，其国民不能自由发表负责的言论与主张，不能合理的批评政治的措施与人事，其新闻的记载只能限于好的一面，而绝不许暴露坏的一面，这个国家便不是民主国家。又假定一个国家，除掉一个在朝的执政党而外，绝对不许其他在野的党派合法的存在”，“从政治的活动上限制他们，这便更不是民主国家。更假定一个国家，其人民的身体自由毫无切实的保障，可以由若干秘密的或来历不明的机关非法拘捕，非法处死，甚至不知拘捕于何地，幽禁于何所，处死于何时，”这便不仅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是一个十足的反民主的国家！为此，他们强调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那么，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向后推宕。并提出，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是国民党放弃十余年来的

---

<sup>①</sup> 华西日报社论·中国当前的民主问题·1944年5月22日。

特殊地位，结束训政，无保留无犹豫给予人民以各项基本自由。<sup>①</sup>6月20日，由张澜等人组成的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又召开大会，对国是提出十项主张，强调非立即实行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要求切实实行民主，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人身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集会结社之自由；同时，刷新政治，给予各级民意机关以必要的权力；切实改革征兵、征粮、征税之弊端，严惩贪污，杜绝中饱，革除苛扰，以减轻人民痛苦，并实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加强抗战力量。<sup>②</sup>8月底，张澜还指出：“今天中国假如还不实现真正民主，第一，起码不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而单凭少数‘天才’是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第二，没有民主政治，民权就不能伸张”，全国人民受到的压迫，人民的力量就不能够发挥出来。他还特别告诫广大人民，实现民主，要靠人民去斗争，“用磕头的办法，无论如何是磕不出民主来的。”<sup>③</sup>

除各党派参加这场民主宪政运动外，民族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也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中，都表示要争民主，争自由。

上述情况表明，民主宪政运动已深入人心，中国人民渴望民主和自由的心情是何等迫切，但此运动缺乏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在实践中必须解决。共产党再一次地顺应了这个潮流，提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领导各民主党派把这场运动推向了新高潮。

## 二、各民主党派响应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认为，提出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于1944年8月17日指示中共参政员与各民主党派协商，提出各党

---

①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② 张澜等对国是之十项主张，新华日报，1944年7月3日。

③ 张澜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新华日报，1944年9月6日。

派联合政府问题。<sup>①</sup>这个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政治。”<sup>②</sup>董必武、林伯渠等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即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协商讨论，以何种形式提出问题。中共认为，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正式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问题。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认为：如果以共产党名义提出的话，会引起参政会大争论，他们就不便很好地表态予以支持，还是以林伯渠在大会的报告中顺便提出组织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林伯渠、董必武将这一商量结果拍电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复电同意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意见，不以共产党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事宜。

9月15日，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作了国共两党谈判情况的报告，表示欢迎“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对国共关系采取政治解决的方针”，如实说明国共之间的悬案（军队、政权与党三方面的问题）谈判仍无结果，为了停止敌人进攻和准备反攻，迫切“需要团结与动员全国力量。”为此，中共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sup>③</sup>以加强全国团结抗战。林伯渠的讲话道出了大多数参议员的共同心声，因此，当他发言时，“全场肃然无声，为本届历次大会中仅见者。”<sup>④</sup>

10月10日，周恩来又发表了题为“如何解决”的著名讲演，代表中共中央进一步阐明了召集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对于国事会议与联合政府的人选以及执政的原则与职责等作了具体的说明。其主要内容为：第一，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

① 毛泽东对董必武电报的批示。1944年8月17日。

② 中共中央致林祖涵、董必武、王若飞电报。1944年9月4日。

③ 林伯渠关于国共两党谈判情况介绍。新华日报，1944年9月17日。

④ 记者旁听记。时事新报，1944年9月17日。

党中央军、地方军、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第二,国事会议,应于最近期间召开。第三,在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通过切合时宜,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错误政策。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第五,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周恩来强调指出,必须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只有这样,“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sup>①</sup>

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集中地反映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意志,给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和民主自由的斗争指明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因此,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广泛响应,各民主党派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并广泛吸收无党派人士入盟,这就推动了民盟组织上的发展和巩固工作。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以余个人观点,改革缺点,必须大开大门,非真正实行民主,不足以集中人才,伸张民意,以改革政治。枝枝节节而为之,不足以振作一新。”“目前时局,极端危险,余个人认为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共

<sup>①</sup> 周恩来,如何解决,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2日。

同组织政府，成立联合政权，实为今日解决国事，挽救危亡所必需。故中国民主同盟亦主张联合政权。”<sup>①</sup>

9月24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张伯钧与中共代表董必武等500多人，在重庆迁川大厦礼堂举行集会。与会代表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张澜主持了会议，并发言揭露国民党一党专政造成的恶果，强调了实行民主的重要性，他说：“民国已经33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如今弄到政治、军事、经济各部门都陷于十分困难之中，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时间不等人，我们将来要民主，而目前挽救危亡，尤其需要民主。”章伯钧也说：“中共提出举行国事会议，民主同盟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共同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实行联合政权这一条路，这是国内的舆论！”而在今天“只有立即召开国事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时局。”<sup>②</sup>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说：“大家所讲联合政权，国事会议，其实都很平常，容易做的，问题在政府能否接受。”鉴于此，他倡议立即成立重庆民主促进会。中共代表董必武也在会上发言：“政府所要求人民的，人民都做到了。1200万壮丁，3000万石粮食，种种捐税都承受了。而人民所要求的言论集会结社三种自由，还没有做到。不实现这三种自由，不实现民主，中国就要亡国。但是，光有这三种自由，今天还不能得救。一定要彻底改革。我们向参政会提出的是召开国事会议和联合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动员起来，团结全国人民，把日寇打出

---

<sup>①</sup> 张澜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华西日报，1944年9月29日。

<sup>②</sup> 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集会要求改组政府的消息报道，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7日。

去！”<sup>①</sup>董必武的发言博得了与会人士的热烈掌声。

10月1日，重庆各界在重庆银行举行追悼邹韬奋逝世大会，宋庆龄、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沈钧儒等800余人出席会议。沈钧儒致悼词，与会者悲愤填膺，强烈谴责国民党实行法西斯专政迫害民主战士邹韬奋的罪行。林伯渠在会上致词，呼吁为消灭法西斯，实现民主政治而斗争！邓初民在会上大声疾呼：“现在是我们向法西斯进军的时候了！”此次追悼会，实际上变成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士一起控诉国民党反动统治，要求民主政治的大会。

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对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公开声明支持共产党的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具体有以下十项：第一，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第二，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之自由，废除现行一切有妨害上列之法令与条例；第三，开放党禁，承认各党各派公开合法地位，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第四，迅速筹备实施宪政，立即召开全国宪法会议，制颁宪法；第五，在宪法颁布前赋予国民参政会以各民主国家议会具有之主要职权，并扩大省议会之职权；第六，充实一切地方自治基层组织，普遍实行民选；第七，废除特务及劳动营等类组织；第八，简化政治机构，分明权责；第九，本公平原则，按照生活指数，改善公务员待遇，并厉行裁汰冗员，严惩贪污；第十，对于战时战后受灾人民，统筹切实救济。<sup>②</sup>

同天，昆明各界6000多人举行保卫大西南的群众大会，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此会是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由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进步社

<sup>①</sup> 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集会要求改组政府的消息报道，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7日

<sup>②</sup>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32

团、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等联合发起的，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人士参加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揭露和抨击了蒋政府实行消极抗战和独裁的政策，提出了坚持抗战、实行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政权，成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动员一切爱国力量保卫大西南的要求。<sup>①</sup>重庆复旦大学举行国庆纪念晚会，千余师生出席，检讨当前时局，周谷城教授说，在这空前危机的时候，应该团结各种力量，才能渡过困难，但这就必须首先实行民主。许多集会者激昂地喊出：“要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行动！”

救国会的沈钧儒，在1945年《新年希望》一文中，要求改变国民党政府政治机构，使“举国一致的政府能早日实现。”张申府在“一个呼吁”中，提出应即由各党派及其他社会有力之士，开诚协商，订立共同纲领，成立举国一致的统一政府，并“由此统一政府切实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sup>②</sup>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章伯钧在元旦献词中，提出召开紧急时局会议，树立“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国策之各党派的民主统一政府。”<sup>③</sup>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等60余人，1945年元旦发表“为转折时局献言”，呼吁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切实合作，挽救时局危机。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李济深、冯玉祥也因对蒋介石集团控制和消灭异己的政策表示不满，拥护废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上述情况表明，共产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后，得到了各党各派的热烈拥护，使民主宪政运动的斗争目标更加集中，规模和声势也越来越大。但是，各党派和全国人民的这个正义要求，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拒绝。

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的广播讲话，用召开

---

<sup>①</sup>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248。

<sup>②</sup> 沈钧儒：新年希望，新华日报，1945年1月1日。

<sup>③</sup> 章伯钧：新年献词，新华日报，1945年1月1日。

所谓国民大会的宣言，来平息众怒，抵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3月1日，蒋介石又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讲演说：共产党最近要求中央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政府的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与全国的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理论与事实而不相容的局面。他还说，吾人只能还政于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派会议，或其他联合政府。还说什么，组织联合政府，将招致抗战失败，国家紊乱。最后他声称，要在1945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这些表明，蒋介石还顽固地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蛮横地拒绝了全国人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正义要求，国民党统治者此时已最终撕下了所谓准备“实施宪政”的伪装了。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还是本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继续向国民党提出，召开各党派会议，促成全国的团结和统一。1945年元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时局宣言，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匆忙召开反民主的国民大会，还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等十条主张。<sup>①</sup>宣言发布后，国民党当局禁止人们了解其全部内容。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却全文刊登了这个宣言，国民党竟然下令禁止出售当天的《新华日报》，并派军警四处搜查，一经发现即没收或撕毁。《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遂将报纸抱至街头发给群众。由于报童勇敢机智，当天的报纸大部分都发出去了，最后还卖到200元一份报。毛泽东在2月12日写信给《解放日报》社长博古，指示他在该报上全文发表民盟宣言，并在电台上广播其内容。<sup>②</sup>3月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又都对蒋介石的演说进行了有力的

<sup>①</sup>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sup>②</sup>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264—265



批驳。4月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专门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阐明了共产党的正确主张。

### 三、陕甘宁边区的联合政府

共产党在这场民主宪政运动中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并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共产党的政治战略之一部分；并不是只要国民党怎样做，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搞民主联合政府。事实上，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统一的，要求国民党应办到的，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首先办到，作出榜样，以告国人。

为了团结一切抗日民主人士共同奋斗，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采取了“三三制”的联合政府政策，即共产党员占 $\frac{1}{3}$ ，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 $\frac{1}{3}$ ，中间分子占 $\frac{1}{3}$ 。并且规定，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也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sup>①</sup>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结构就是按共产党的上述原则来设置的。人民代表机关即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是民意机关，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构。边区参议会由12人组成，共产党员4人，占 $\frac{1}{3}$ ；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8人，占 $\frac{2}{3}$ 。它是采取平等、直接、民主、无记名、差额等投票方法选举出来的，他们来自人民，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他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最容易为人民所知晓、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809

接受、理解，而广大群众的疾苦和困难也最容易通过他们而得到解决。所以，边区参议会是人民参政议政的有效组织形式，人民拥护它。边区的政府机关共 19 人，共产党员 6 人，占  $\frac{1}{3}$  弱；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 13 人，占  $\frac{2}{3}$  强。比较著名的人士参加边区参议会和政府的有：安文钦作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李鼎铭作边区政府副主席，贺连城任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教育厅副厅长，霍子乐任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建设厅副厅长。边区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政权。<sup>①</sup>

在这个政权中，实行共产党的领导是毫无疑问的。但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实行强迫命令、压制的办法去推行共产党的政策，也不是靠共产党员在边区政权中的绝对多数来压倒其他民主人士，要他们就范。只是靠共产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去工作、去团结、影响和争取党外人士，让他们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从而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权。这种合作，只能是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方法。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做法是：第一，积极采纳民主人士的正确建议。众所周知，“精兵简政”，是李鼎铭等 11 人在 1941 年底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来的，毛泽东看到这个提案后，当即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变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还说过，这条意见提得很，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后来，中共中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普遍推行。第二，实行定期轮流汇报制度。边区政府规定，每周举行一次工作汇报会。向主席、副主席汇报工作，参议会副议长、政府正副秘书长也参加，由政府部门的各厅、处、院

<sup>①</sup> 1940 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

主管人员轮流汇报，有具体问题当场商量解决，决不拖延。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等重大议题时，除经党组织研究外，还必须向党外民主人士汇报，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再提交政务会讨论。第三，实行民主协商制度。边区的任何重大问题共产党员必先与非党民主人士进行民主协商。政府每次召开政务会议之前，有关单位的党员负责人须向李鼎铭等民主人士提出会议的内容和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取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召开会议。如果他们不同意会议的内容，共产党员就再与他们进行磋商。如再不同意，便缓期开会，继续与他们协商会议内容，提出他们的看法，多次讨论，直到他们同意为止。第四，非党人士有职也有实权，履行其职责。政府发布命令、法规性文件，必须由党外人士担任的副主席签署后才能生效。如1942年9月边区政府委员会讨论中共西北局提出的土地条例，秘书长李维汉作了说明，但李鼎铭对其中一条不同意，因而不签发有关这个文件。这时，共产党西北局书记高岗亲自到他家，主动听取了他的意见，并且共产党作了适当的让步，工作做通了，取得了一致意见后，他才同意签发这个文件。另外，有些行政工作，不需要经过政务会议通过，直接要由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先向李鼎铭先生说明内容，取得他的同意，然后再办理签署划行手续，共产党人不包办代替。第五，以诚相待，以诚相见，交心谈心，多方面多层次地交换不同意见，不隐蔽重大问题，政治问题具有比较高的透明度。同时在生活上也对他们给予适当照顾，不改变民主人士的特殊生活习惯。所以，边区的“三三制”政权不是摆门面，作样子，乃是脚踏实地的真正合作。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共产党“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政权和军队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

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sup>①</sup>

由于陕甘宁边区实行了民主协商，合作共事的制度，所以，边区调动了党外民主人士的爱国心、正义感和主人翁感情，他们不是以局外人来对待根据地政权，而是以“我们团体”这样的字眼。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区货币发行数量时，李鼎铭马上以主人翁的姿态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也知道。”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时，一个英国记者自由单独地与李鼎铭谈话，记者问他：“你是不是有职有权？”他爽朗地笑着说：“我有职有权。”副议长安文钦也在回答外国记者问题时，痛骂国民党，大讲边区政府的好处。后来这些英国记者对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sup>②</sup>

当然，边区政府在共产党与民主人士合作的开始阶段，也有过一些失误，如：包办代替现象时有发生，把民主人士当客人、傀儡等。自从1941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上强调：“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此后，边区政府的民主合作问题就逐步走上健康的轨道，实行真诚的与民主人士合作的制度，把各抗日阶层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使得全国人民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有了榜样，看到了胜利的前途和人民共和国的远景，坚定了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信心。

这一阶段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基本上同第二阶段，区别不很大。这段时间主要是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要求国民党实现民主自由、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743

<sup>②</sup>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23—

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互相配合得很好，从而提高了民主党派自己的政治地位。在民主宪政问题上，国民党顽固派采取破坏和抵制等一系列行径，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此事后，使民主党派不少领导人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作用。不久，蒋介石迫于各种情况，不得不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把民主团结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总之，抗日战争八年时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是真心诚意而又密切的。在抗日这个大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对待国民党顽固派这个问题上，不是所有的民主党派领导人都认识得很清楚的，有时也有反复，他们不可能像共产党那样对蒋介石有深刻的认识，要想他们都达到共产党的认识程度恐怕难以做到，如果这样要求那也是不切实际和苛刻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只要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合作真诚就可以了。抗战八年的密切合作也不是说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了。在具体的行动纲领和斗争中，共产党提出方案，他们配合实行之，也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共产党成了他们的主心骨。但是，不少民主党派领导人，在思想和认识上不大可能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理论与行动往往不是一回事，不可能一致。在纲领上，政治宣言中，他们更不可能认识到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客观条件也不允许他们这样作，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即使有这种认识的民主党派人士也不可能公开表达出来，如果表达出来了，那也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所以，我们考察后认为，彻底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并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那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事。到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他们才彻底丢掉了幻想。民主党派领导人宣布要跟共产党走。这是他们历史的进步，是时势造成的必然。